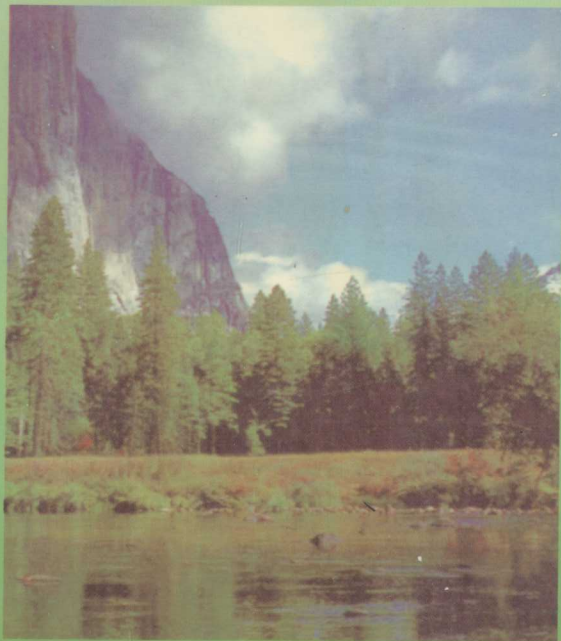


韶华集

● 大连出版社

● 肖丽芳 著

作家文丛·理论卷



● 肖丽芳 著

韶华集

作家文丛·理论卷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韶 华 集

肖丽芳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 116011

本溪市仁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6.5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责任编辑:星鸣 责任校对:士城 封面设计:谷子

ISBN 7—80612—507—8/I·73

定价:12.50 元

序

张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合在一起发展至现在，也已经是将近一个世纪，可以号称百年文学了。这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仍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却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不可以相比的。数十年来，几乎是伴随着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人们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可以说，但凡一些重大问题和重要作家作品，差不多都有人探讨和涉猎。由此，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发出过“文章做得差不多了”的感喟，有人甚至真的将注意力和兴趣转而他。但实际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许多作家作品也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对其作出更为合乎客观实际的定位和评价。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就像一座含量极丰的富矿，足可以让我们不停地进深挖掘；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就可以取得一定收获。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开矿大军。在这支开矿大军里，丽芳同志是相当勤奋的一员。比较起许多占据着相对有利地势的开掘者，她拥有的条件不算好的。她不在重点教研院校机关，甚至不在大中城市，而是

长期据守东北一个不大的山城，在一所极为普通的高校任教。今年夏天，我借赴外地开会的机会顺道在那个城市停留了一下，给我的印象那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城市。满眼烟囱林立，文化氛围不多，学术空气就更稀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缺资料，二乏信息，三缺交流，可她一待就是二、三十年。她没有寻找机会要求调到更好的工作岗位，更没有在商海大潮冲击下转变方向，而是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寒，多少年如一日，教学不停，研究不停，终于在自己的园地里获得可喜的成果。我这里说的“可喜成果”，不但指她理所当然地评上了高级职称，更指她都教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日积月累，写出和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问题和作家作品的论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至今仍清楚记得我和她以及另几位我当年的学生和战友在那座山城聚会时的情景，我是怎样被她（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的精神和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取得的成绩所感动。当时，我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老泪的。这是庆幸的泪，欣慰的泪，叹人生之多艰而又感苍天终不负苦心人！

丽芳同志现在也算是老教师了，但在我眼里她还是和过去那样活泼年轻。说起来我和她有着两度师生缘，一次是60年代她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一次则是80年代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后，她到研究生院读进修班。应该说我对她是比较了解的。即以她的专业说，她不但勤奋努力，而且学风扎实，对研究问题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不抄近道，不钻冷门，不搞哗众取宠。这从她写的一些文章足可看出。如她肯定我国新文学的“遵命”选择，积极评价左翼文

学的“激情美”，强调文学不能脱离生活，以及更多关注赵树理、孙犁等这样一些作家……总的看来，好像不如有些年轻人那么时髦，那么新潮，但如真的潜心细读这些文章，就能深深感到作者思想的深度和纯洁的情趣。对此，我作为又比她老一点的教师，实在是从心底感到欣慰，感到高兴。现在，她把自己的文章结集交出版社出版，并且要我趁此机会说上几句话，我不想推却，也不应推却，就说了以上一些。我的着眼点倒不在她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希望她以此为新的起点，更加努力，继续奋进，从而取得更大成绩。是的，她还有时间，有潜力，应该再辟蹊径，更上层楼。

目 录

序/张恩和	1
论我国新文学的“遵命”选择	1
赵树理小说世界与延安风骨	12
转侧看花花不定 ——评孙犁小说的美学风格	23
论左翼文学的激情美	35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审丑艺术	72
郁达夫小说的审美特色	83
《沉沦》的病态美赏析	95
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	100
我国现代小说象征艺术的美学特征	108
我国现代小说象征艺术的美学功能	119
百花齐放总是春 ——我读“新写实”小说	126
《三寸金莲》的困惑	136
人有病,天知否? ——《朝鲜战争中的女人》创作心态探析	143

熙高小说创作的使命意识-----	152
诗化的人生与人生的诗化	
——评张捷的诗歌创作-----	159
《海上阿波罗》和华舒的艺术追求-----	170
为有源头活水来	
——评李学勤同志的写作编著-----	177
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生白皮书》-----	183
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生活-----	185
谈文学作品的审美的分析研究-----	187
后 记-----	193

论我国新文学的“遵命”选择

当研究界兴师动众地立志要突出文学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下决心摆脱社会政治历史的约束,为我国新文学进行科学分期、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人们又一次发现或感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中国革命竟是如此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雨中,我们的新文学和中国革命经受了相同的考验与一样的悲壮,和中国革命有着惊人的同步同质的经验与教训。新文学的轨迹和中国革命的轨迹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究其根本原因,归结于我国新文学的主流始终在自由自觉地坚持一种“遵命”的价值选择:文学应该是有所为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文学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甚至文学应该成为革命的工具或留声机。因此,我国新文学热诚地拥抱现实,贴近人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从而,它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升沉兴替,创作方法的寻找确定,文学主题、文学题材和文学人物形象的演变,美学风格的调节,作家创作的发展,作品体裁的扬弃,都无一不受到中国革命的严格规定或影响。正视新文学的这一“遵命”选择事实,正确评价新文学的这种“遵命”选择,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探其生命本源,诞生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我国新文学本来就是革命的孪生儿,应该认为,“遵命”是新文学与生俱来的

自由自觉的生存意识和价值选择。1915年，进步知识分子抱着献身的爱国热情，以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为阵地，向几千年顽固的封建观念猛烈开火，形成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其中，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共同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两翼；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成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可见，新文学的诞生正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结果。因而，我国新文学一经问世，就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与用文言载孔孟之道、替圣贤立言的封建文学根本相对抗的真文学、活文学，一种身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新文学，热情地为当时“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目标与任务奋起呐喊，勇猛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迷信，自觉地、实实在在地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条重要战线。

在新文学的成长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又强化了新文学的“遵命”本能。新文学发展的时代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时代，是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权威的时代，同时也是为建立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而自觉建构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时代。也就是说，新文学的发展与这一时代的变迁是同步的。这使原是思想解放运动一条重要战线的新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一个部分，一条战线。于是，用革命的文学创作去论证权威意识形态一系列命题的正确性，通过各种具体形象去激励、锻冶、点燃人们的意志与热情，成为新文学的基本任务。因此，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新文学的“遵命”选择更加明确、坚定，终而举起“遵命”文学的大旗。

不难看到，“遵命”选择使新文学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富有

二十世纪中国国情色彩的发展道路。在初始阶段,新文学无论是描绘下层人民的苦难,鞭挞中国人的“国民性”,或者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苦闷,呼唤个性解放,都无一例外地既是新文学自身的生存需要,也是在遵其母体新文化运动之命。“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给新文学以鲜活的生命和革命的灵魂,新文学也没有辜负新文化运动的期望,它切切实实地成为当时“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以此“革新政治”的“利器”。在各种形式与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新文学或是抒革命之情,或是剖析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虚伪,或是形象地提出问题向封建营垒发难,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支劲旅。正当新文学义无反顾地在反封建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我国新文学随同中国革命的质变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走俄国人之路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更加自觉地听从革命的召唤,“遵命”意识更加强烈,其主流迅速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劳工神圣”口号的影响下,新文学初始遵循的反封建的贵族文学的平民文学主张,进而具体为表现普通人中的下层工农,文学为人生的口号推进至文学要成为中国革命的工具,反封建的个性解放主题升华为抒写无产阶级理想。自从1923年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上明确提出革命文学主张,要求文学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做革命斗争的工具或武器,1928年以后新文学的主流就一直旗帜鲜明地以此为目标向前发展。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文艺整风,其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基本理论,实质上是把文学遵命肯定为一项党的文艺政策。由此,新文学的“遵命”行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新阶

段。遵照中国共产党对文学的希望和要求，新文学从“五四”时期的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转向大写新英雄豪杰、歌颂革命的英雄主义；从为改造“国民性”而描写、批判民众的思想病态，转为抒写人民群众的崇高品德、颂扬我国的优良传统和优良民族精神；从强调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创建新形式，转向继承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形式……这些转变，无一不是为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所决定，无一不是新文学遵命的结果。而且，这些转变，一直延续到新中国以后的新文学“当代”时期。

上述新文学的诞生成长说明，我国新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母腹中就获得了革命的遗传基因，形成了它亲合进步，向往革命的“天性”。在它诞生后的成长中，中国革命虽经曲折但终究是向前发展并走向胜利的强劲现实和力量又使这一“天性”进化为近乎“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品格。因此，我国新文学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参军入伍”的文学，其“遵命”选择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属于有价值的文学追求。

从文学的性质来看，我国新文学的“遵命”选择更是理直气壮的。

文学艺术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尽管它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有别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其它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它整体地综合地反映生活的特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种种意识形态都可能在其中得到反映。文学作品实际上往往是文学家在一定的社会思潮、社会集团利益、社会生活的需求或社会发展变革的趋向的影响下，即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向广大社会公众的一个“发言”，一个“公报”。文学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它

来源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因此,文学艺术总是起着巩固或瓦解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一般说来,文学不但具有激励和感染人的思想感情的作用,有帮助人们了解、认识的作用,而且,文学还能起到促进团结的作用,甚至讽谕时政、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恩格斯从巴尔扎克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6卷第77页),列宁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受到巨大的影响,认为“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怎么办》译本序),曹禹说郭沫若的《女神》使他“鼓满了热情的希望”……相反的例子同样也举不胜举。文学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功能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极大重视。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各阶级都千方百计地亲近文学,努力把自己的烙印深深地打在文学身上。文学就这样和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斗争中或增加、或减损它的价值和意义。所谓“文以载道”,所谓“代圣贤立言”,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谓“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武器;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谓“文学家是阶级的耳目与喉舌”(高尔基《论文学》第216页),所谓“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瞿秋白文集》(一)第397页),就是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上道出文学创作绝不是文学家个人出于内在需要或毫无目的的排解与宣泄,绝不是不受任何外部条件制约、不被任何社会力量驱动、不为任何时代精神感染、不取任何客观价值的无为无谓之举,说明文学绝非既无所求,又无所图的纯粹于消闲的玩艺。事

实上,文学在阶级矛盾的漩涡中,总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意图、目的、期望和追求的。同时也由此分野出文学作品的素质、品位、价值和意义的层次、分量与性质。不难理解,文学遵命并不是游离于文学表面的外部属性,更不是人为地附加给文学的一个赘疣,而是与文学自身同存共在的生命基因,它是由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文学无可摆脱的阶级性所决定的生命本能或生存选择。在阶级的社会里,带有阶级性的文学不是遵这个阶级的命,就是遵那个阶级的命。超然政治,疏离阶级实是一个心造的幻影,这恰如鲁迅所说“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也就是说,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决定了文学遵命的特性。“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崇高、最理想的向往与追求,我国新文学毅然将此定为“可依”的高枝,这是自主的生存选择,是其主体意识高扬的有力体现。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是“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文学的性质决定,文学从来不是文学家个人的事业,而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因此,文学“遵命”是必然的。我国新文学遵无产阶级之命,遵中国革命之命,最终成长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学,无可非议,完全正确,应该给以充分肯定。

文学“遵命”,归根结蒂是文学家“遵命”。“五四”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家集合在“遵命”的旗帜下,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在题材、形式、风格等各方面都有举世瞩目的开拓或创新,为新文学奉献了一部又一部赢得世界声誉的杰作,从而使文学“遵命”成为新文学的方向和主流。鲁迅先

生是我国新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他就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的。鲁迅先生明确告诉我们，他的小说都是“遵命文学”。正是那些表现深切、格式特别的“听将令”的呐喊，象号角一样震醒了封建“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使鲁迅先生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成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确，鲁迅先生的“遵命文学”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拔地而起的高峰，是以里程碑的形式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文学遗产，其“遵命”所获得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在新文学的发展中，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学的方向。鲁迅先生“遵命”而进行文学创作，郭沫若、茅盾、赵树理、丁玲、贺敬之……也都是把自己的创作和政治和革命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也都是主张文学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取得了具有现在价值和将来价值的文学创作成就。新文学的另一伟大奠基者郭沫若认为文艺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曾满腔热情地主张文学家“当马克思、恩格斯的留声机器”，把文学“遵命”推到一个近乎偏激的高度。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文学艺术活动中，他始终是身体力行地对待这一文学价值观的。“五四”时期，郭沫若以大气磅礴、光芒四射的浪漫主义诗篇，去唤醒青年，“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鼓舞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为寻求光明与自由而走上献身革命的征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才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才是鲁迅先生久久期待出现的“摩罗”诗人——“精神界之战士”。抗战时期，郭沫若又

用历史剧为当时的政治和革命服务，轰动效应空前。由当时宣传抗战、鼓舞斗志的形势和政治需要决定，郭沫若几乎在每个历史剧中，都有意设置形形色色的、有权有势的反面角色，使他们和立足于民族前途的志士仁人之间，形成直接的利害冲突，从而构成壮美风格的悲剧。显然，这是一种把革命和时代情绪溶进文学艺术而出现的壮美。视文学艺术为政治留声机器的郭沫若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不断获得了更大更多的激情，把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推到一个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遵命”终于使郭沫若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颗璀璨的巨星，成为“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在新文学的创作队伍中，茅盾是一位集革命战士和作家于一身的文学巨匠，三十年代以“遵命”意识强烈的“社会剖析小说”蜚声文坛，轰动社会。他立足在小说中宣传马列主义，表现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阶级特征鲜明，情节的冲突、发展往往由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所决定，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着。非常明显，茅盾小说是经过马列主义理论透视的，是近乎“足赤”的“遵命”文学。然而，正是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在开创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繁荣局面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33年，茅盾的《子夜》出版，人们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无可否认，《子夜》、《春蚕》等规模巨大、反映生活深刻的作品，把现代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文学服从于政治绽开的艺术之花，是我国新文学“遵命”选择的重大收获或价值实现。沈从文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应该承认，沈从文是个有才情的作家，而且，就其生活经历的丰富，就

其接触下层群众生活的广度,就其艺术尝试的多样性,就其创作产量的丰盛,他应是较之茅盾等同志更有条件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人。然而,沈从文虽然对我国新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文学的骄傲和自豪,但是,沈从文却没有达到堪称伟大作家的一列。原因就在于他对文艺服从政治的不屑一顾。他认为文学服从政治,就成了在朝在野者的“宣传品”,成为“虚伪”、“浮夸”、“不落实”、“无固定性”、“一会儿就成过去”的东西。因此,沈从文一直沉幻于湘西古朴的风土人情之中,陶醉在湘西水手悠扬的号子声里。他的作品虽然极纯至美,不无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是终究属于空灵虚幻忧伤绵软的一类,不能进入一流或伟大的层次,这正是疏离政治给沈从文带来的创作局限或创作遗憾。可见,新文学中作家作品成就与价值的大小高低,“遵命”选择是相当关键的。

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欧风美雨”的吹熏,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文学理论上的许多是非被弄颠倒、弄混淆了,含混不清的概念和似是而非的推导一哄而起,本体论、价值观、形式说和主体性都发生了偏斜,直接影响到我国新文学的研究和建设。因此,正本清源的工作非常重要和迫切。事实胜于雄辩,我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历程。无须讳言,“遵命”选择确是我国新文学主流的特质。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伟大而痛苦的历史蜕变过程中所闪耀的巨大智慧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新文学自然为其倾倒;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继而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迈进,是无比壮丽的革命事业,在这神圣的事业面前,其它一切都黯然失色,新文学愿为其献身。因